

新观察

后人类叙事中的 人类视角和后人类视角

——以王晋康和陈楸帆为例

□郁旭映

围绕后人类产生的种种思想运动与流派,人类主体与后人类主体的关系一直是议题的核心。悲观者将后人类视为威胁,认为后人类之生即意味着人之死;而乐观者则试图证明后人类与人类主体不仅不断裂,甚至认为后人类主义即人本主义的自我批判,因人类的自由意识本身就寻求自我超越。当我们追问悲观与乐观的源头,会发现隐藏在恐惧或兴奋之下,其实是人类视角与后人类视角的差异。王晋康与陈楸帆的后人类科幻叙事分别展示了这两种视角。

人类视角: “硬异化”和“改进式异化”

早在1997年,有感于克隆羊的诞生、电脑深蓝战胜人类国际象棋王这两大事件,王晋康就在国际科幻大会上断言:后人类时代已经开始。2014年,他再一次发表《后人类时代宣言》,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后人类的看法。他将导致人类向后人类的跃迁归结为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两个层面的异化:“硬异化”和“改进式异化”。“硬异化”是指科技对人在物理层面,也即是对人的身体的改变。相对于科技在人性、社会习俗和思想方面的改变,即其所指的“软异化”,他显然对“硬异化”更感兴趣。在他看来,改变人类的物理本体更直接、更有效和分量更重,它不仅反过来改变人性,而且让这一进程不可逆转。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概括了导致智人(人类)走向末日的三种技术:生物工程、仿生工程与无机生命工程。这三种技术让智慧设计取代自然选择,打破人类的演化规律。王晋康最热衷的硬异化,主要是指生物工程中的基因技术。“改进式异化”则意味人类不满足于对自身的修补,想要自己充当上帝,改变原始设定。一般意义上的医疗是为修补,而基因工程则致力于改进。从修补到改进的跨越,就必然产生“后人类”。

王晋康发表于2003年的《新人类四部曲》对“硬异化”和“改进式异化”的后果进行想象。四部曲对基因技术的应用进行了层层递进的畅想:《豹人》想象了基因嵌入技术合成猎豹基因和人类基因来制造“飞人”,《癌人》用永生癌细胞来克隆出身体具自我修复和再生功能的“癌人”,《海豚人》用基因改造技术将人类和再力嫁接于海豚的身体制造出更适于生存的海豚人,《类人》则完全用人造基因、机器生产的方式来制造出身体与意识结构与人类无差的类人。这四部作品无一例外地都表现了人类与后人类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均以人类或后人类个体死亡为代价。冲突和死亡的书写除了引起恐惧之余,更引出一系列问题:冲突的本质是什么?基因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的实质是什么?人类到底恐惧什么?这些问题实际上为我们预设了人本主义的视角。

首先,这四部作品中所有的新人类都在向人类寻求他们的合法性:豹人要通过奥运会冠军的成绩来证明成功;癌人为躲避人类的追杀而假装死亡隐姓埋名混迹于人类生活之中;即使海豚人已经成为海洋霸主,但最智慧的海豚人仍想要成为人类先祖的妻子来获得认同;而类人奋起反抗则是为了取得象征人类身份的指纹。尽管作品通过“合法性争议”讽刺了人类根深蒂固的对于“他者”的排斥,但作品仍是以人类的利益与情感来审视后人类的生存价值。这些异类身上所延续的是人类之爱,或对人类的爱。

其次,与经典的反乌托邦/恶托邦模式类似,基因技术背后必然有技术狂人的存在,他们试图扮演人类的“上帝”角色。这四部作品中的狂人上帝形象迥异:有的为技术成果可不惜一切代价,有的因投入情感而开始反思,有的从文明延续的角度高瞻远瞩,有的则对人类与类人的界限嗤之以鼻。固然,在新人类的制造过程中,王晋康对技术狂人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但隐藏在表面上的差异性之下,我们仍能看到作者相对统一的标准,是否审判狂人,要看人类上帝们自己是否是以维护人性的尊严和道德为底线或使命。目中只有技术而无人的豹人制造者咎由自取地被人维护者所杀,而相反,类人制造者则可以坦荡地既反对人类的“贱民制度”,帮助解放类人,而同时又反对对人类本身,因为在他看来人类与类人之间的“堤坝从本质上是不人道的”。“人道”一词可视为王晋康在“新人类”议题上的基本立足点。

再者,新人类四部曲所描述的未来既包含不确定的恐惧,又指明了需要坚守的立场。小说常用人类与新人类个体的死亡换得一时警醒或和解的契机,既不会逆转也不会停止技术的发展,但对于社会整体而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功利主义与“优生学”的种族主义伺机而动。王晋

王晋康的反乌托邦/恶托邦式的后人类想象,表达的是对自由主体丧失和人类伦理崩溃的焦虑,是人本主义批判的延续。陈楸帆的后人类想象则展示了有别于人本主义的努力。

他们所共同珍视的人类之爱,在前者仍是完整的,是需要坚守的立足点;在后者则是分散的,成为一种需要打捞的记忆。

康显然并不满足于只是展现生物技术带来的劫难,他更试图明确如何应对是为合适。海豚人虽然已经在智力、能力和数量上成为了地球霸主和幸存者,依然恪守着人类先祖为他们制订的不称霸的道德原则和海洋生物圈的自然法则。人并不自主反抗人类,争取权利,反而少数自然人替他们不平,来奋起领导解放。究其原因,是因为前者对人类道德秩序的继承让后人类实际上成了人性延续者,而后者则证明对于平等的追求恰是人性之体现,是人与非人的本质区别。

在为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所作序言中,周濂如此概括福山的态度:“展现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必须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遇见危机。与此同时,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却也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这也正好适用王晋康《新人类四部曲》中后人类叙事的特征。

后人类视角: 人类的匮乏和镜像作用

陈楸帆是更新代作家中对后人类主题最为执著的一位。在他看来,“后人类,这是当前历史阶段最为深刻的异化过程”。通过对异化的聚焦,他关注人类在与科技互动中,所面临生理、心理到社会关系的结构变化。但与王晋康对生物工程的迷恋不同,他作品中的技术想象多是关于人机结合的赛博格或是人工智能,也即赫拉利所说的无机生命(inorganic life)工程。宋明炜曾评价陈楸帆的《荒潮》,认为它表现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的萌动,一种不惮于吸收技术以建构自我的新技术,以及一种对于后人类身份的自觉认同。“除了《荒潮》,陈楸帆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如何以后人类主义视角来克服人类中心主义。

在他的作品中,后人类的出现源起于人类的匮乏。这种匮乏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既不是出于疾病、劳动工具等的功能性需求导致的技术失控,也不是来自科学狂人的精心设计。在王晋康那里值得骄傲的人类道德和情感,在陈楸帆这里都变得可疑。在赛博格来临之前,人类已经是孤独、疏离、弱肉强食和自相残杀。遵循旧文明传统的人一边敬神一边作恶,有心守护的人因为怯弱和无助而助纣为虐,生育和繁衍的求生本能被无限地控制与利用,被亲情欺骗、放弃,因而恐惧和孤独。这就是后人类介入之前的人类文明状态。《荒潮》小米1不无讽刺地说:“人类,总是过分夸大后天文明教化的作用。”《这一刻我们是快乐》说得更加直白:“哪怕是基因上100%的纯种人类,都会被视为异类加以毁灭,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文明。”与其说现代技术打破了教化的基础,不如说它揭开了人类文明虚张声势的真相。陈楸帆在作品中用种种叙事技巧,来揭示人类的旧文明与消费主义下的赛博文化一样,都已成了“空洞的能指”。

在人类走投无路的情境下“横空出世”的后人类有着多种面目,或是赛博格、或是AI和算法、或是父亲一般的机器、或是未来代言人,他们代表一种新的主体,一种挑战我们习惯认知结构的自我意识。正因为他们不是给定的自由人本主义式主体,因此,陈楸帆笔下的后人类既不



郁旭映

是为了跟人类作生存竞争,也不来充当拯救者,既不为满足人类的期待,也不必代表反抗的力量。甚至,连他们的消亡也不能反证人类的胜利,因为意识可上载安那其云,可备份。正如小米1说:“我是偶然,我是必然。我是一个新的错误。我既是主宰又是奴隶,是猎人又是猎物……我只是个开始。”面对习惯性想要技术为我所用的人类,未来生育掌握者SHIIVA Lab说:“我们针对其中一些有趣的设想进行了实验,但没有接受其中任何一个请求。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想法都太可笑了,经典人类式的可笑。”后人类浑沌未明的面目,恰恰意味着新的可能:“复杂动态性、不可预测的本质,意味着主体性是新出现的,而不是假定的;是分散式的,而非只定位在意识中;从混乱的世界中出现,并整合进入一个混乱的世界,而非占据一个已被移除的掌握的位置”(海尔斯)。

尽管陈楸帆并未明确人类如何在后人类的指导下重新认识世界,建设文明,但是显然,给予人类的“礼物一代”也好,演示种种可能的“人生算法”也好,展现AI的爱也好,宣布人类历史的重启也好,人类需要,也不得不以后人类的参照来重新定义人类自身。但前提是,只有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习惯于自我和他者界限分明的人本主义主体开始消解,才能开启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展望新的主体和愿景。

那么,问题已经转变为:在后人类时代,人类还有何为?《恐惧机器》中的后人类次品阿古延续了人类残存的恐惧记忆,凭借恐惧,他发现了机器的秘密:“机器让我们无惧,机器让我们恐惧,机器利用我的恐惧,让我像忠于父亲一样地忠于它”,更意识到“如果一台机器能够消灭所有恐惧,那它就是最应该被恐惧的机器”。由此,残存的人类记忆获得了它的使命:“也许在这个新世界,不再需要父亲。”《美丽新世界的孤儿》中仅存的人类杜若飞以“被动、温和、知足、忍耐”的孤儿特性,“像一面镜子,照出这个新世界的病症”。《人生算法》中,过了“最庸常琐碎人生”的弟弟如同神迹一般,为事业有成的哥哥所设计的人生算法中补充了“爱的算法”。这些设定看上去回到了王晋康式的人道立场,但根本上是警惕人类中心主义的。陈楸帆在《未来史》中反复强调,人类的智慧如何为邪恶的天才发挥到淋漓尽致,“有神的地方必然会有魔鬼栖身之处”,这同样适用于后人类时代,人类之于后人类,正如后人类之于人类,他们该互为镜像,阻止新的中心。

王晋康的反乌托邦/恶托邦式的后人类想象,表达的是对自由主体丧失和人类伦理崩溃的焦虑,是人本主义批判的延续。陈楸帆的后人类想象则展示了有别于人本主义的努力:他一边引入后人类视角去打破“人类历史上素有去中心化的努力最后都演化为新中心的形成”这一权力循环,但一边又希望人类的记忆与经验能成为后人类时代的镜像,避免新的“美丽新世界”。他们所共同珍视的人类之爱,在前者仍是完整的,是需要坚守的立足点;在后者则是分散的,成为一种需要打捞的记忆。



第一感受

故乡是一支悠远的牧歌

——读漆宇勤《二十四节气里的少年》 □袁恒雷

当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年近不惑时,怀乡写作便更多出现在了这批作家的笔端。这不光是因为年岁渐长、乡愁越深,实际上,故乡题材一直占据创作者大部分的领域,我们总是对自己最熟悉的人与事更有感触,故乡总是人们心灵深处最柔软的一块。

漆宇勤近年来的创作题材,在对故乡的描摹上更为细致殷勤。他早已离开故乡多年,身居城市的他回望故乡的时候,因为一定距离的时空观察,反而拥有了更加清晰完整的观照。在他的作品里,故乡是一个全面呈现出来的效果:美丑善恶、衣食住行、风物地貌。自传体小说《二十四节气里的少年》展现了他童年完整的成长轨迹。主人公李子就是漆宇勤的化身,新奇之处在于,他能够运用二十四节气在故乡,也就是一年四季的气候变迁来展示个人在故乡的成长轨迹。虽说他展示的只是赣西一地的风土人情,但这种

普适性又何其广阔,整个乡土中国都是在这样的季节变换中繁衍生息的。本书从“立春”开始讲起,每个节气下面运用散文诗般的语言介绍这个节气的地位与特点,这种特点不光是季节的气候,还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希冀。比如立春,作者带着这样的向往:“这是一个新起点,也是一段好时光,春风十里已在路上。从此,梦想可以发芽。从此,草木渐盛,春水初生。”接着,作者又简略交代节气的相应“物候”“花事”“美食”,具有一定的农时百科性质,也让接下来所写的内容提前交代得清清楚楚了。

作为一部以赣西为基点的考察小说,《二十四节气里的少年》具有鲜明的地方风俗志特点,文中写到的每一个节气都有至少一个令人印象难忘的乡村习俗与之对应,比如立春时节的“见赞”、春分时的“除狗

鸭苗”、芒种时的“新麦换面”、大暑时的“新米敬天”、秋分时的“木柴烧塔”、冬至时的“晒红薯片”、小寒时的“碾糟榨油”等等。这些民俗多与食物有关,对故乡的眷恋往往是关乎味觉的记忆。漆宇勤在这些往事的讲述中融入了或轻松调皮、或哀婉伤感的情感因素,赣西山村的山川风物、花鸟鱼虫、瓜果梨桃、蜂蝶飞舞等等,在他的笔下犹如一幅缤纷多姿的画卷徐徐展开。

阅读《二十四节气里的少年》是轻松又略带点伤感的旅程,所以说轻松,是因为里面的各种讲述常常会让人会心一笑,感叹以李子为核心的那一批少年的快乐成长。伤感是因为其对年少时期的回望,这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成长旅程,一些习俗在时代的变迁中已逐渐淡出,如同追忆故乡往昔的美好一般,是一支渐行渐远的悠远的牧歌。但我们还是感叹着这这里里风的风朴、乡人的热情、自然的馈赠。

关注

从来没有一本书在我脑子里形成这么多的点,书里书外,不同的空间、时间,不同的点。以致在书里的案头,通常写作的地方,很难结构这些点。不要说结构甚至这些点在没有一个适合的空间之前是模糊的,似乎一直等待着“宇宙是一个图书馆”那样的地方。果然如此,在码字人书店,在周围顶部都是书的空间,在某天一场安静的有九个环节的茶道中,那些模糊的点脱颖而出,十分明亮,形成了妙不可言以致晦涩的结构。很难描述这结构,因为是多维的,并且有些点是突然浮出甚至溢出的,比如《江村经济》和《忧郁的热带》,不知这个满是繁星的书店是否有这两本书?

2010年,陈涛站在老鲁院五楼课堂面对新一届学员,我坐在下面,我的同学都叫他陈涛老师,他是班主任,他不过30岁,我大他20岁。我曾在讲台上讲课,现在又成了学员,这会成一些麻烦。我问他陈涛老师,他制止了我,他叫我“肯哥儿”,我问他“涛哥儿”,很多事他找我,我们之间有种种模糊不清、十分混沌、表面轻松实际极其庄重的关系。没错,陈涛庄重、潇洒、大气,庄重的核心是情深义重,是内在的一种张力,一种他这年龄少有的气场。有时我觉得我们之间20年的时间差距消失,我们真的是兄弟,甚至得到来自他的关心时他更大一点,至少在身高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但又极其庄重的东西,班里有不少诗人,或前诗人比如我,30年前,1980年早春,我在长城脚下对积雪融化写下一首诗《积雪之梦》,发在《萌芽》上,班里举办诗歌朗诵会,我讲了这段非常“80年代”的经历。我读了这首诗“如果我融化了/就是说,土地不会再沉默/而我,我会歌唱的……”读完我惊讶地看到陈涛眼眶有平静的泪水,而这也正是我内心的东西,一致的东西。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写的一句诗:“诗人醉了/酒从眼睛流出”,我觉得陈涛就是,陈鹏形容陈涛用了“滚烫”一词,我以为准确。

另一个回忆的点:2013年,陈涛告诉我他因工作要调动,不在教学一线了。再后来他告诉我他要去甘南,一个村子,挂职两年,没任何不安,但能够感到他的兴奋。他知道我的过去,许多年前我曾脱离生活既定轨道,纵身一跃去过西藏两年经历。陈涛的一切我都持开放态度,我曾放弃诗歌,创办过广告公司,一切都是经历,一切都没什么,这次当然更是,我好像回望自己。的确,读陈涛这部《山中岁月》我时想到自己,但又是如此不同。

忽忽两年,就像电影的一行字幕,接着是这本陈涛讲述自己、讲述一个村子的几乎幻象般的《山中岁月》,我当年去西藏一个小村子时不过25岁,仅仅是一名村中学校教师,陈涛的身份复杂得多。2015年陈涛来到甘南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是35岁,文学博士,一个小女儿的父亲,一个90开外奶奶的孙子,青年批评家、机关公务员、池沟村书记、诗人、观察家,改变成脱离了既定生活轨道的实验者,最终成了本书的作者。全书16篇,记录多重身份的陈涛在池沟村挂职“第一书记”两年时间所见、所做、所思、所感,见证并身体力行了中国一个村庄以及一个小镇两年来的方方面面的变化。

陈涛住在镇上,骑摩托车下村“田野调查”,但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更主要是一个改变者。到村工作后,他多次与镇书记交流,问自己主要做些什么,书记的回答有趣又意味深长:“不着急,你先慢慢适应,慢慢感受。”的确,这话甚至非常有哲理,对一个挂职人员,体验某种意义上比行动更重要。而适应,感受就是扎根,与这里血肉相连。“这样也好。”陈涛沉下来,《山中岁月》写道:“平时我跟镇、村干部在村里工作,闲时就一个人走走转转。”池沟村群山纵横,经济条件差,“一块块耕地像补丁一样散落在山腰,我常站在山底望着山顶的袅袅炊烟,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那些交通不便、缺水少电、毫无经济来源的日子要怎么改变?”

修路、教育,非常古老的两个现实性问题,人类发展的两个基本单元。修路、搬迁、博弈,“上午与卖场主人达成了协议,道路可以接着施工了”,陈涛写道:“与村口的人家也商量好,补助八百元,让他把门口猪圈拆掉,起初给他四百元,他同意了,后来又反悔了,无奈之下追加了四百元才算彻底解决。”不管怎样,事情有进展,陈涛多少还是有点成就感。但随后这家主人的儿子说了此事,坚决不同意,说原本要在此地盖房子,提出了极高的条件,成了的事又吹了,路停下来了。主人的儿子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全家享受低保待遇,二是用自己家别的地块换一块村里的宅基地。这两个条件根本无法满足,第一是政策上不允许,第二是客观上做不到。副镇长讲完后埋头吃饭,陈涛听完后也埋头吃饭,“大家都继续默默地吃饭。”池沟村小学校外表看条件还不错,但是当走进三楼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陈涛问校长这间屋是干什么的,答曰这是我们学校图书室。连个书架都没有,只墙角桌子上摆着几摞书,老旧不堪、不适合孩子读。可否做这些书架?陈涛问,答曰:没钱。

两年时间在人生一生中不算长,但对一个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基本田野调查,两年时间绝对算长的。1935年春夏,25岁的费孝通来到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写出了《江村经济》,驰名世界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为该书写了序言,认为《江村经济》是社会学里程碑式的著作。几乎与费孝通平行,1935年27岁的中学教师列维-斯特劳斯拉踏上驶向南美航船的甲板,来到巴西支教,期间断断续续做了一些田野调查,后应一家旅游出版社之约写出了《忧郁的热带》,该书既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随笔,也是结构人类学的典范之作。列维-斯特劳斯拉夫的结构人类学继承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将语言学中语素之间的关系引用到对文化的探讨中,认为那些具体的事物是没有意义的,一栋房子是没有意义的,一些精美的家具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些刻在石头、木板上的符号也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他们之间的结构与关系,是以怎样的方式将它们联结在一起,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然而对于《山中岁月》的作者,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是有意义的:修路是有意义的,埋头吃饭是有意义的,儿子的条件是有意义的,图书室墙角的桌子是有意义的,困境是有意义的,小镇青年的酒事是有意义的……当然,不用说,这一切之间的“结构与关系”“怎样的方式联结在一起”更重要。事实上没有前者的重要就没有后者的重要,这当然包括但超出了结构人类学或社会学,这正是《山中岁月》的不同。适应,感受,时间,生长,慢慢地血肉相连,长在一起,包括了田野调查,是主体,同时也是客体,包括了对自己的“田野调查”以及自身的“人类学”,说到自身的“人类学”我特别欣赏陈涛这段十分自觉的话:

“在北京这个庞大喧嚣的城市待久了,日趋固化的生活里的自己被紧紧嵌在了时间的链条中,就这样身不由己地向前滚动,滚动。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做过许多事,有时将每天所做的事记录下来,长长的一排,但过段时间试图总结一下时,又不知道真正做过了什么。没时间回望,更看不清前路。”他说:“想到能有这样一段安静的乡下时光,从固有的轨道中脱离,在一个时间尚未变成碎片的地方学习与思考,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幸事。毕竟适当地跳脱,于人生而言弥足珍贵。两年,看似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它在人生的旅程中,却是很短的瞬间。庆幸的是我在挂职之初便意识到了这个道理,所以我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虚度这段时光,因为它会让今后的人生具备更多丰富的可能。或许在很久以后,当我回望这段人生的时候,我才能清晰准确地看懂此时此刻的生活,以及深陷其中的自己最真实的内心。”

毫无疑问,未来山中岁月会显示“更多更丰富的可能”,《山中岁月》也会越来越厚,因为会不断印证,《山中岁月》会像陈涛一样,一样庄重。

岁月的印证

□宁肯